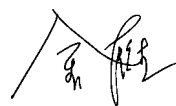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評論

十月革命九十年

俄國有過「十月革命」嗎？



一 俄國歷史進程中的「斷裂」問題

1997年，在俄國革命八十周年時，我和秦暉曾在《二十一世紀》發表過兩篇文章，其一討論革命的背景，主要是俄國歷史上的農村公社傳統，以及1905年自由民主運動失敗後發生的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改革對於革命的影響；其二討論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傳入俄國後，在上述背景下被「俄國化」的過程，尤其是傳統民粹派西化(社會民主黨化)和列寧派社會民主黨「超民粹主義」化這一「雙向異化」的過程①。

在普京時代的俄國，國家主義思潮的興起，侵蝕了俄共的社會基礎，使轉軌中磨難最多的俄羅斯，反而成為唯一沒有出現東歐各國普遍經歷過的「轉軌陣痛導致『左派』上台」的國家。

十年過去了。這一時期俄國、中國與世界又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人們對1917年的認識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普京(В. В. Путин)時代的俄國，國家主義思潮的興起，一方面侵蝕了俄共的社會基礎，使轉軌中磨難最多的俄羅斯，反而成為唯一沒有出現東歐各國普遍經歷過的「轉軌陣痛導致『左派』上台」的國家；另一方面這種「右翼強國夢」也導致了民主進程的某種「退步」和以斯拉夫主義反對「西化」的某種「保守」傾向。從懷念蘇聯大國地位的角度讚賞斯大林時代的言論也明顯增加，甚至當年最激烈的異見人士索爾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據說也有這類言論。於是，中國的左派輿論便大肆宣傳「索爾仁尼琴悔過了」②。其實，了解索爾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當年就是從斯拉夫—東正教傳統的角度來反抗蘇聯的極權體制，早在1970年代他就與當時異見人士中代表自由主義與「西化」傾向的薩哈羅夫(А. Д. Сахаров)發生過著名的「索—薩論戰」。今天的索爾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抱怨俄國的「西化」。在索爾仁尼琴的觀念中，列寧比斯大林壞得多，斯大林當然也比傳統沙皇壞(但或許比「西化」的葉利欽[Б. Н. Ельцин]「好」些?)。而普京則被索爾仁尼琴寄予復興舊俄傳統的厚望，因而對他十分看好。

基於這樣的認知，索爾仁尼琴不僅對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惡痛絕，而且對導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樣反感。他從1970年代末開始，窮二十多年餘生之力寫作十卷本長編紀實文學《紅輪》^③，其1986年問世的第三卷就是講述二月革命的。而二十年前他為該卷寫的綱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錄〉^④，於今年二月革命紀念日重刊後更是洛陽紙貴，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評價，普京甚至把該文作為文件發給政府官員們「學習」。索爾仁尼琴也為這次再版重寫了序，極力強調反對「激進主義」對當今俄國的重要性，同時也指出導致激進思潮的社會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過變革（他語焉不詳，但顯然不是列寧或葉利欽式的「西化」變革）除弊，「革命」的幽靈就仍在徘徊。

在這篇文章中，索爾仁尼琴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俄羅斯傳統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後者同樣激進，並且直接導致了後者。聯繫他的其他論述，我們看到他實際上打破傳統的「左右」和「主義」界限，給出了新的「兩條路線鬥爭」，即東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羅斯道路」和赫爾岑（А. И. Герцен）—列寧—葉利欽的「西化」道路。建立蘇聯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禍，埋葬蘇聯的葉利欽改革也是「西化」之禍。那麼，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葉利欽否定的晚期蘇聯，豈不都成了「俄羅斯傳統」的象徵？而葉利欽與普京這前後相承的兩人如果截然分屬「兩條路線」，又何怪列寧與斯大林也有區別：前者當然是十惡不赦的「西化」派，而後者如今似乎曖昧地具有了某種「斯拉夫特點」^⑤。這種論點與十年前筆者提到的劇變後俄羅斯褒獎斯托雷平的言論一脈相承，也與中國近年來把五四、啟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來一併予以否定的保守主義很相似。

然而，這個看法與蘇聯時期把二月革命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固然衝突，但也與後蘇聯時期自由知識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卻自認為是「二月民主」繼承者的態度大異。如果說1990年代索爾仁尼琴此說在當時文禁初開、眾說紛紜的情況下並無多大影響，那麼在普京與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與索爾仁尼琴互相讚賞而共倡「保守」的情況下，這種說法似有逐漸成為主流與官方話語之勢，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把「二月」與「十月」一鍋端地予以否定，既不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繼承者，即今天俄國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駁。

作為反對黨的自由主義者亞博盧聯盟領導人亞夫林斯基（Г. Явлинский）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國的專制君主制由於不能適應進步而崩潰，在不經暴力和流血的情況下人民選擇了民主，開始建立一個現代的、歐洲式的憲政國家。儘管後來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毀滅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輝煌，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轉的。他呼籲慶祝二月自由的節日，絕不放棄「二月主義」的旗幟。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羅斯的名義團結基金會」主席尼科諾夫（В. Никонов）則反駁說：「1917年二月不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幾天內毀滅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是此後一切不幸的根源。至於維護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張，由於了無新意而影響漸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義者既不滿索爾仁尼琴的保守

索爾仁尼琴實際上打破傳統的「左右」和「主義」界限，給出了新的「兩條路線鬥爭」，即東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羅斯道路」和赫爾岑—列寧—葉利欽的「西化」道路。

主義解釋，也不滿亞夫林斯基的自由主義解釋。如舍林(С. Шелин)就認為索爾仁尼琴與亞夫林斯基雙方都出於精英立場，誇大知識階級的作用，而他認為1917年俄國的命運是由普羅大眾決定的^⑥。但是，舍林同樣沒有對「二月」與「十月」作出區分。

顯然，如果說在1990年人們對1917年革命的爭論焦點在「十月」，那麼時過境遷，今天「1917年」問題的焦點已經是「二月」。不管是同樣肯定「二月」、「十月」的左派，還是對「二月」、「十月」一併加以否定的保守派，在看到「二月」與「十月」的連續性方面其實是一致的。而像亞夫林斯基那樣區分兩者、肯定「二月」而否定「十月」的觀點，的確面臨解釋的困難。筆者在十年前的文章已經指出：1917年二月劇變的直接原因雖是戰爭引起的危機，但深層原因卻是「專制主義市場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積累的民怨。劇變很快變成對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復「公社世界」的浪潮，這決定了它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

但是，「二月」以後俄國的發展就完全是連續而沒有「斷裂」嗎？如果像索爾仁尼琴所說，包括「二月」、「十月」在內的1917年革命是一場急劇的「西化」而且並未逆轉，那麼幾十年後葉利欽再來一次「西化」的根據何在？其實索爾仁尼琴的敘述已經暗示，列寧以後俄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而且儘管索爾仁尼琴本人並未明說，但那些把沙俄、蘇聯都看作「偉大國家」(列寧與葉利欽則都是瓦解「偉大國家」的罪人)的保守主義者，都認為變化似乎發生在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由此才引申出所謂索氏「悔過」之說)。但是這種說法雖然與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以後的蘇聯官方觀點有點類似(只是赫魯曉夫褒列貶斯，而今天的保守主義者則褒斯貶列)，但卻沒有甚麼根據。如今絕大多數人都看到，列、斯的體制基本一致，差異只是枝節。

如果斷裂不在「二月」、「十月」間，也不在列、斯之間，那麼它在哪裏？這是總結1917年歷史的一個關鍵問題。今天的中國同樣存在「保守主義」把文革與五四、1911年與1949年一鍋煮的問題，存在以所謂「傳統」和「西化」來解釋歷史的文化決定論史觀。而最近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更帶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極權化的問題。1917年的俄國歷史應能提供一個借鑒。

二 「革命憲政」與「二月民主」

立憲會議，按今天的通常譯法即制憲議會或憲政議會。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競爭、分權制衡、民主選舉基礎上的這套制度源自西歐，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制度。從詞彙上使用「立憲會議」而不是用「杜馬」，反映出「西化派」與「傳統派」的區別。在近代俄國，立憲會議的主張不但被保守的沙皇專制主義者拒絕，而且也曾被宣傳「人民專制」理論的俄國革命民粹主義激進派攻擊為「富人的騙局」和「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與這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會使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裏)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⑦決裂的一批左派人

今天的中國同樣存在「保守主義」把文革與五四、1911年與1949年一鍋煮的問題，存在以所謂「傳統」和「西化」來解釋歷史的文化決定論史觀。而最近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更帶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極權化的問題。

士，形成了俄國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當年布爾什維克也曾積極要求國家民主，而且非僅「階級民主」，今天所說的憲政民主也是他們當年強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就要求「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⑧。

因此，是主張憲政民主，還是反對憲政而鼓吹「人民專制」，就成為那時區分俄國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界標。普列漢諾夫 (Г. В. Плеханов) 曾明確地說：「『自由主義者所忙於爭取的』『抽象權利』正是人民發展所必需的條件」；西方式的議會政治「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階級 (按：即無產階級) 的『組織工具』」。在普列漢諾夫看來，無產階級應當比資產階級自由派更積極地追求憲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專制」則不過是一種「反動」的「政治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華帝國或秘魯帝國，即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的皇帝專制」，是「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垃圾」^⑨。普列漢諾夫的這些話構成其名著《我們的意見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的基本觀點，而他更早些時候出版的《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 也表述了類似主張，這兩部作品加上其哲學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 是普氏為俄國馬克思主義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寧說成是「教育了俄國整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文獻，其影響十分深遠。

從上述觀點可見，在追求憲政民主的問題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一開始就與反憲政的民粹主義者相對立，而且曾經比自由主義者更急迫。換句話說，在此之前社會民主黨人與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義的區別就在於「激進立憲」(革命立憲) 還是「漸進立憲」。儘管在斯托雷平時代開始有所變化：社會民主黨內以列寧為首的一派 (即布爾什維克) 愈來愈「民粹主義化」乃至「超民粹主義化」^⑩，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革命憲政」的傳統感召力和對民粹派「人民專制論」的傳統厭惡還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時代，列寧一方面說了不少 (過去很少說) 議會民主「虛偽」的話，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駁那種認為「虛偽民主」不如專制好的極左極右論調。他認為：儘管多黨競爭下的政黨宣傳「帶有廣告欺騙性質」，但這一點決不能說明議會民主「根本無益甚至有害，像頑固的反動份子、議會制度的敵人極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樣」，恰恰相反，沒有這樣的多黨制，欺騙「會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騙局、查明真相的辦法也會少得多。」「一個國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議機構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眾就越便於……學習政治，即越便於揭穿騙局和查明真相。」^⑪

通常所說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憲政」的實踐。由於「斯托雷平反動」斷送了俄國在1905至1907年間曾經一度大有希望的、通過君主立憲建立議會民主的機會，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動的市場經濟發展又掏空了傳統皇權主義的基礎，並因對傳統農村公社實行掠奪性的專制私有化而積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當對外戰爭冒險失利觸發了社會危機後，全俄便急劇地捲入革命漩渦。隨着貌似強大的沙皇專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潰，君主立憲的前景已不復存

在追求憲政民主的問題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一開始就與反憲政的民粹主義者相對立，而且曾經比自由主義者更急迫。社會民主黨人與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義的區別就在於「激進立憲」(革命立憲) 還是「漸進立憲」。

在。「雪崩」的衝擊下，不用說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傳統保皇黨已無蹤影，斯托雷平體制下得勢的專制市場經濟改良派，如十月黨、進步黨等自由主義右翼派別也很快被革命潮流衝垮。只有自由主義左派，即1905年事變中因領導激進憲政民主運動而在斯托雷平時代受壓制的立憲民主黨，成為唯一還有政治號召力的自由主義黨派。但該黨由於擔心斯托雷平改革所激起的民粹主義反彈浪潮難以控制，更擔心戰爭時期（立憲民主黨是支持參戰的民族主義者）後方劇變會瓦解軍事力量，這時反而主張放慢立憲步伐。這樣一來，以「立憲」為黨名的這個1905年的政治改革激進派，在1917年卻把立憲會議的大旗拱手讓給了「社會主義者」。

而當時被革命形勢推向前台、成為俄國最強大政治勢力的，是兩大左派（當時通稱兩大「社會主義政黨」^②）——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黨內部都有明顯分化：社會革命黨傳統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義」推進「人民專制」起家的極左黨，但這時它的主流已經在斯托雷平時代發生了「社會民主黨化」，只有其堅持原教旨民粹主義的支派，即所謂「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帶有「人民專制」色彩。至於社會民主黨本是傳統的「革命憲政」主張者，其中的孟什維克此時仍然持有俄國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革命憲政理念，而布爾什維克儘管已經在「超民粹主義化」的路上走得很遠，但仍然保留着社會民主黨傳統的「革命憲政」話語，其激進主要表現在不斷指責別人拖延憲政進程。列寧本人當時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認為「在自由的國家裏，管理人民是通過政黨的公開鬥爭以及它們之間自由協議來進行的」^③。

在二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列寧指責臨時政府拖延立憲會議選舉，但並沒有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中的影響也不大。後來他兩度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其含義只是：（1）蘇維埃取代臨時政府來承擔籌備召開立憲會議的責任；（2）排除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主導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亦即左派多黨聯合政府。他並沒有說要用蘇維埃取代立憲會議，相反他仍然強調蘇維埃只應該在立憲會議之前臨時掌權——正如他在「七月事變」後所說：「在立憲會議召開前，除了蘇維埃以外，國家不應該有任何其他的政權存在。」^④在列寧所指責的對手中，除立憲民主黨擔心民粹主義浪潮難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會革命黨主流派和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的「革命憲政」熱情本不下於布爾什維克，只是考慮當時德國正大舉進攻，基於「革命護國主義」^⑤立場，才不願把太多精力投入競爭性選舉，更不願在這個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連自由派都已靠邊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勢下一味激化矛盾而使局勢失控。

因此，經過斯托雷平時代的政治分化與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後，傳統的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分野已經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戲劇性的分野：兩黨的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結盟，反對兩黨各自的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主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前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以民

經過斯托雷平時代的政治分化與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後，傳統的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分野已經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戲劇性的分野：兩黨的各一部分結盟，反對兩黨各自的另一部分。

意黨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義或超民粹主義傳統，而後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普列漢諾夫開創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正統。但是在1917年，雙方都還沒有脫離「革命憲政」話語。

三 並不「震撼」的冬宮之夜

在二月革命後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個期間，包括所謂「十月革命」的前後，俄國政壇上的鬥爭焦點，除了對外關係上的「和平」與經濟上的「土地」外，政治體制上就是盡快召開、還是推遲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聲稱那時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存」的狀態，然而實際上，不但二月以後相當時期內布爾什維克並未在蘇維埃中佔優勢，也並不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只是強烈指責臨時政府拖延召開立憲會議。甚至就是在他們控制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據以發動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時，雖然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但也只是把它作為革命措施，而並未宣布蘇維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當時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明確宣布：「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掌握國家政權」^⑩。他們繼續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布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⑪。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⑫。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Рабочий путь*）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把唯一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⑬！

就在俄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不僅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唯一有權決定國際問題的機關^⑭。他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⑮。

可見正如「土地」（廢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復農村公社）與「和平」（退出世界大戰）一樣，「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實際也是眾望所歸，無人反對。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蘇聯時期被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蕩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不同黨派構成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都有，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⑯。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快」的主張者上台而已。

實際上，這個變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經開始：俄曆10月24日，各黨派召開的共和國預備議會上，社會主義者已佔多數但尚容納了幾個立憲民主黨

從「二月」到「十月」，動蕩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不同黨派構成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都有，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

人的克倫斯基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聯合政府受到抨擊，兩大社會主義政黨提出議案要求「通過一項法令把土地移交給土地委員會」、「堅決支持建議與盟國宣布和談條件並開始和平談判的對外政策」，這兩項要求與蘇維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幾如出一轍。此議案戰勝立憲民主黨的反對，以123票對102票被預備議會通過。此舉相當於對聯合臨時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沒有當夜的「冬宮事件」，它也將導致出現一個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而僅在兩周前這正是布爾什維克追求的主張²⁹。

由於列寧的堅持，儘管中央委員會中季諾維也夫 (Г. Зиновьев)、加米涅夫 (С. С. Каминев)、盧那察爾斯基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李可夫 (А. И. Рыков) 等不少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還是在此前退出了預備議會，並趕在「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出現前搶先奪取了政權。雖然採取的是類似軍事政變的手段，可是當時俄國處在非常時期，前五屆政府也並非經過全民選舉，而且期間還有「四月危機」、「七月事件」、科爾尼洛夫 (Л. Г. Корнилов) 兵變等非常事件，與之相比，十月冬宮之夜「水兵與士官生的衝突」也不算多麼激烈。其實，在傳統上農民出身的俄軍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權主義和保守傾向，「士官生」，即有文化而又並無軍官特權的「軍人知識份子」，曾是俄軍中最富進步精神的力量。自12月黨人事件以來他們一直是傾向民主的，而二月革命後他們中多數還傾向社會主義——自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反沙皇、甚至反對右翼自由派方面，他們與布爾什維克並無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後初期自由派主導臨時政府時，他們還與布爾什維克關係良好。當時彼得格勒軍事學校社會主義者士官生聯合會經常請布爾什維克人士在他們舉辦的「社會主義理論講座」上作演講³⁰。只是在社會主義黨派主導聯合臨時政府後，由於不滿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傾向」，他們才成為冬宮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這天晚上奪權與被奪權的雙方，其實還多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黨內同志」——都是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是被奪權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員，多為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而奪權的是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在一般人看來，黨派的差別還不如前幾次政府更替的雙方差別明顯³¹。

所以，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的美國記者里德 (John Reed) 後來對十月革命的報導以《震撼世界的十天》為題而聞名於世，但在當時這場變革不要說對「世界」，即使對彼得格勒人而言也並非多麼「震撼」。起義當晚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布〈關於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稱：起義「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³²而軍事革命委員會任命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政委別雷舍夫 (А. В. Бельшев) 事後報告說：軍艦「在彼得保羅要塞打出信號彈之後發射了幾發空彈，準備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打實彈。結果無需如此，因為冬宮很快就投降了。」³³

中國人在後來的長期宣傳中婦孺皆知的所謂阿芙樂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所謂武裝起義，其實不過如此。事實上，二十多年後拍攝的電影《列寧在十月》(Ленин в Октябре) 中攻打冬宮的衝鋒陷陣場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碼後改拍而成。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時間問世的愛森斯坦 (С. М. Эйзенштейн) 的

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的美國記者里德後來對十月革命的報導以《震撼世界的十天》為題而聞名於世，但在當時這場變革不要說對「世界」，即使對彼得格勒人而言也並非多麼「震撼」。

著名影片《十月》(Октябрь) 儘管已經受斯大林權力的影響，還沒有這樣的場面。而當時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與赤衛隊湧向冬宮大門時，由冬宮的防衛長官親自打開宮門，並把他們帶到了臨時政府部長們正在開會的地方²⁰。一直反對暴動的溫和派布爾什維克黨人盧那察爾斯基在當時的家書中也不無寬慰地記道：「事變竟輕易實現」，「暫時犧牲極少。暫時。」²¹顯然，這場「暴力革命」幾乎是波瀾不驚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當時也相當低調。蘇維埃政府當晚成立時自稱是「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²²，人們也將其作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來接受。應當說，支持布爾什維克當晚行動的人並不多，而反感者亦不少。如前所述，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都有相當一批人反對以這種方式奪權。他們當然支持以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取代臨時政府，但既然以蘇維埃的名義做這件事，總應該由蘇維埃授權。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實，「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就奪取政權，這一點我想誰也不知道。」於是正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斷然抵制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惱火。市民、知識份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這樣，……」「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²³。

但儘管如此，並沒有甚麼人想採取實際行動與布爾什維克對抗。當時俄國人普遍相信，「二月」以來的革命形勢在動蕩中持續發展，而其目標就是立憲會議。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和會議的召開，將意味着「革命憲政」大功告成，俄國將出現一個全民選舉產生的、有權威的而非「臨時」的民主共和憲政政府。到時俄國的政局就會走上正常軌道。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行動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列寧一直相信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革命憲政」會批准他所做的一切。然而，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況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的情況下組織的選舉。

四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劇變來自兩個月以後。

原來列寧一直認為，選舉時由誰執政，由誰來召開立憲會議是至關重要的。顯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革命憲政」會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態發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條件下，選舉按期於11月12至15日進行，25日大致的得票結果是：布爾什維克獲得23.9%的選票，在703個席位中，只獲得163席，遠遠低於社會革命黨所獲40%的選票²⁴。到了1918年年初立憲會議召開前，最終結果揭曉：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佔24.7%，只略高於最初結果；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佔40席)，孟什維克得16席，立憲民主黨得17席，各民族政黨得86席，其餘幾個席位分別屬於幾個小組織²⁵。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他們主持的這次選舉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議席，即使加上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派

社會革命黨，列寧方面也只佔有30%的議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佔有370席，已經明顯過半。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況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的情況下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甚麼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當時布爾什維克反對選舉結果的理由是：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這個理由顯然太牽強了：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你為甚麼又組織了這次選舉呢？

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的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受到「革命憲政」思維影響的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一不得民心的權力。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11月28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布推遲會期。當天一些立憲民主黨人舉行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殺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個多月後，立憲會議才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於1918年1月5日召開。會前列寧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實施戒嚴，並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開會當天，布爾什維克代表建議立憲會議按人民委員會的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布解散，多數立憲會議代表拒絕了這個蠻橫無理的要求。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遂先後退出會議。其餘多數代表在暴力的威脅下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時，終被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當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宣布解散立憲會議^⑨。

這一天，已被嚴厲鎮壓的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不可能發出甚麼聲音。但在左派(即社會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陣營和勞動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農民的不滿是後來才浮現的)中卻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兩個首都發生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參加者可能多達數萬人^⑩。布爾什維克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⑪。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舉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紅旗走向塔夫利達宮(按：立憲會議所在地)」的，而殺手們不僅未經警告就從埋伏的暗處開槍，而且還「從工人們手中奪過革命的紅旗，用腳踐踏它們，把它們投入篝火中」^⑫。俄國最大的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許多工會紛紛支持。罷工被鎮壓後，全俄鐵總和其他非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從此俄國工會逐漸「官方化」。

這一天，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聯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這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開頭、以「社會主義萬歲！」結尾的聲明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塔夫利達宮不讓任何一位立

十月事件基本上是「二月」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敗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勢和社會主義者的上台，10月末如果沒有「冬宮事件」，自由派徹底下野和「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的出現也是勢在必然。

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一個印章。沒有任何『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⑧

除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還聯合發表傳單，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12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沙皇專制式的黑暗時代開始了。」「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⑨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也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9 января и 5 января”)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暴行。他也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並悲憤而又絕望地說：布爾什維克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夢想」^⑩！

顯然，1月5日事件給俄國社會造成的「震撼」遠遠超過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宮事件」。「十月事件」基本上是「二月」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敗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勢和社會主義者的上台，事實上這個變化也是在7月和9月兩次臨時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沒有「冬宮事件」，自由派徹底下野和「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的出現也是勢在必然。儘管布爾什維克的奪權手段招人非議，但既沒有馬上激化社會矛盾也沒有導致甚麼反抗。克倫斯基政府已在「冬宮事件」前一天的預備議會上遭到實際上的不信任投票，產生「第六屆臨時政府」並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宮的克倫斯基等一些臨時政府領導人曾試圖組織反奪權，但因沒甚麼響應者而不了了之。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總等工會組織曾對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持異議，並威脅舉行罷工，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即宣布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結果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這兩個月因而在傳統上被稱為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時期。

但驅散立憲會議就不同了。它把「革命憲政」進程完全倒轉過來，成了革憲政的命，堪稱是二月革命後俄國歷史進程的又一次劇變。按後來「列寧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種說法，這一變化作為「民主」與「專政(專制)」的對決，都可謂超級「震撼」。你可以說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對派的立場)說它是反革命，但唯獨不能說這變化的意義比「十月事件」小。

實際上，甚至「土地與和平」這兩個據說是由十月革命解決的主要問題，當初的爭議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議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憲會議來

驅散立憲會議堪稱是二月革命後俄國歷史進程的又一次劇變。按後來「列寧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

決定這兩者，或者即便蘇維埃造成了既成事實，也要不要立憲會議來承認其合法性。主導最後兩屆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黨派實際上是贊成議和與分地的。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 (В. М. Чернов) 作為臨時政府部長頒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寧的讚許——他甚至起來駁斥「資本家對切爾諾夫進行無恥的誹謗性攻擊」^④。但切爾諾夫等人認為應當由立憲會議來做這兩件事。而像全俄鐵總等一些民主組織雖然認為蘇維埃政府可以做這些事，但還是應當由立憲會議來認可。「一月劇變」使這些人與蘇維埃政權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總之，與「冬宮事件」相比，布爾什維克廢除「革命憲政」的「一月事件」無論就當場造成的流血^⑤，就事件給俄國人帶來的「震撼」，還是就事變內容的社會深刻性和歷史影響來看，都要大得多。沒有「十月事件」，俄國肯定也會出現社會主義者政府。當然，民主競選制下誰也不能保證它永不下台，但「十月事件」中產生的那個「永不下台的社會主義政府」如今又安在哉？而如果沒有「一月事件」，憲政下無論左派還是右派政府就如其他民主國家的社會黨政府與保守黨政府一樣，不會讓「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夢想」慘遭破滅，讓俄國陷入慘烈血腥的內戰，更未必會在俄國歷史上造成七十多年的極權時代。

與「冬宮事件」相比，布爾什維克廢除「革命憲政」的「一月事件」無論就當場造成的流血，就事件給俄國人帶來的「震撼」，還是就事變內容的社會深刻性和歷史影響來看，都要大得多。

事實上，1917至1918年間俄國並不是發生了兩次，而是只有一次革命，其開始與終結則成為震撼世界的兩件大事：它於1917年2月發生時不僅是「民主革命」，而且當時就終結了斯托雷平的資本主義改革，在邏輯上開始了導致社會主義者執政的「向左一面倒」進程。換言之，它是民主革命，卻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按如今人們習慣的政治光譜來劃分，毋寧說它更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而1918年1月社會主義者（儘管並非布爾什維克）佔壓倒優勢的立憲會議被武力驅散，意味着這一革命的終結，它結束了民主，開始了「專政」（但未必是「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兩者之間的「十月事件」，既不是社會主義的開始，也不是民主的結束，只是「不穩定的民主國家」中常見的一次政變而已。

後來人們用來稱呼「十月革命」的「開闢人類歷史新紀元」之說，考諸歷史，這話最早出自托洛茨基 (Л. Д. Троцкий)。他下面還有一句話：「開闢了鐵與血的新紀元」^⑥，後來人們卻不提了。但他是在二月革命後從國外僑居地回國時說這番話的，那時還未發生「十月事件」，可見他指的就是二月革命，但是「鐵與血的新紀元」真正到來，卻是「一月劇變」後的事了。

五 「一月劇變」與內戰

事實上，所謂十月革命後相對平靜的政局，即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局面，正是在這場「一月劇變」後被打破的。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關於這場內戰各種「官書」上有着許多定義，但是列寧1919年致羅日科夫 (Н. А. Рожеков) 的一封信件有個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

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着走，不情願者命運拖着走。」⁴⁹

十月革命後最初兩個月蘇俄實際上沒有軍隊，似乎也不需要軍隊。自馬克思以來的社會主義者都一貫反對「常備軍」，民兵代表革命，常備軍代表反革命，這種理念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劇變」後僅十天，蘇俄政府即頒布了建立紅軍的法令。法令仍許諾「在不久的將來實行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⁵⁰，但很快這個「不久的將來」就被證明無限遙遠。二月革命以來布爾什維克最積極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嚴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諱：「紅軍的組織原則與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是非常相似的」⁵¹。而實際上前者比後者更嚴厲，包括推行殘酷的人質法和什一法。用當時的話說，民主已經過時，現在是「對信奉過的一切要憎恨，對憎恨過的一切要信奉」⁵²。的確不這樣也不行，「一月劇變」後各地的小規模叛亂很快蔓延升級，到5月間捷克斯洛伐克戰俘叛亂和薩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內戰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認為，直接導致內戰的原因有三個：廢除立憲會議導致民主派的反抗，對德和約引起「愛國主義者」的抗爭，以及餘糧徵集制激化與農民的矛盾。但實際上，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在幾個月後即隨德國戰敗、蘇俄廢約而不復存在；餘糧徵集制雖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但作為一項具體政策，應當說它是內戰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雖然它引起的農民反抗導致了內戰延長。因此，解散立憲會議，亦即廢除憲政，實為導致內戰的首因。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一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А. Ф. Колчак——引者註）」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他們要求在「左派」專政與右派專政之外選擇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是「一月劇變」前的蘇維埃。「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憲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一系列術語⁵³。「專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

這當然不是說後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都是立憲會議的支持者或所謂民主派，而是說：二月革命以來人們期待的憲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動，打破了俄國社會當時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種矛盾都集中爆發出來。不僅各支民主派（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但當時布爾什維克更常稱之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憲會議的旗號反對布爾什維克，先後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薩馬拉、烏法等地形成很大勢力，在格魯吉亞等地還建立了孟什維克領導的民主共和國。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⁵⁴而一

一般認為，直接導致內戰的原因有三個：廢除立憲會議導致民主派的反抗，對德和約引起「愛國主義者」的抗爭，以及餘糧徵集制激化與農民的矛盾。但實際上，解散立憲會議，亦即廢除憲政，實為導致內戰的首因。

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現在隨着憲政民主前景的破滅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他們顯得非常理直氣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遺產憑甚麼就是你的？「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

事實證明：從二月革命到一月政變期間，俄國政局在民主預期下的日益左傾，並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勢力的多大抗拒，像科爾尼洛夫兵變那樣的個案轉瞬間也就平息了。不僅「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就是布爾什維克搶先奪權後，在許諾尊重立憲會議的七十天內全俄局勢仍然基本穩定。正是在布爾什維克摧毀憲政後，右翼反民主勢力起而效尤：繼「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科羅帕茨基(П. П.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一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一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1917年2月開始的進程本來是由傳統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型，結果到1918年1月後演變成「專制」到「專政」之間一場改朝換代式的戰亂。繼1905年後俄國歷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實驗，就這樣以更慘痛的內戰以及內戰後的「專政」告終了。

歷史是由長時段因果關係決定的還是「偶因」造成的？應該說兩種因素皆有。筆者曾指出：1905年俄國曾經有過自由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化進程互相促進的強大勢頭。如果不是那場風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雙輪」之局，俄國完全可能在君主立憲框架下完成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專制下為權勢者對傳統農村公社進行「警察式私有化」積下民怨，加上後來又唐突發動(參加?)世界大戰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導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難免。而且這種「革命」天然具有反對「腐敗的經濟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質，自由主義成為輸家幾乎是注定的：臨時政府難免要社會主義化，立憲會議即便不被驅散，也沒有幾個自由派當選。但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者」中誰能得勢、以及得勢後具體會導致甚麼後果，則是不確定的。主要在政治僑民中活動的布爾什維克最初並無優勢，長期流亡後在1917年4、5月間才回國的列寧、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國內反斯托雷平運動的主力社會革命黨和在工會中影響巨大的孟什維克都曾經很有希望，但是陰差陽錯的權謀較量使列寧最終勝出。1917年2月開始的進程本來是由傳統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型，結果到1918年1月後演變成「專制」到「專政」之間一場改朝換代式的戰亂。繼1905年後俄國歷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實驗，就這樣以更慘痛的內戰以及內戰後的「專政」告終了。

註釋

- ① 兩篇文章皆以筆名發表，參見蘇文：〈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號，頁4-16；卞悟：〈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二十一世紀》，1997年10月號，頁37-47。

② 高國翠：〈「懺悔」的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54-57；吳庸：〈俄羅斯在翻跟斗〉，《議報》，第315期(2007年8月13日)，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910；〈為甚麼反斯大林的索爾仁尼琴會讚揚斯大林〉，<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③ 該書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別於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兩冊俄文版於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它不是首先推出單行本，而是作為《索爾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兩卷問世(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 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5-16. Paris: YMCA Press, 1986)，因此幾乎沒有引起注意。俄文單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羅斯國內出版，英文版迄今尚無。

④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2.2007.

⑤ 所謂索爾仁尼琴「悔過」之說誇張太甚，實際上索爾仁尼琴對斯大林暴政的譴責沒有任何變化，這從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論可見。德國《明鏡》(*Der Spiegel*) 周刊對他的專訪，參見索爾仁尼琴：〈我從未違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25日。但是從「文化」上講，似乎就有點「複雜」了。

⑥ Sergei Roy, "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www.theliberal.co.uk/issue_10/politics/russia_roy_10.html.

⑦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79。

⑧ 中國共產黨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一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41。

⑨ 普列漢諾夫著，劉若水譯：《我們的意見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頁77、40、242、258。

⑩ 卞悟：〈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頁37-47。

⑪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282-83。

⑫ 這是當時公認的「社會主義政黨」。列寧當時也經常這樣表述。後來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肯定布爾什維克「唯我獨社」而其他左派政黨都姓「資」，其實他們的綱領都以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

⑬⑭⑮⑯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53；55；260-61；52。

⑰ 所謂「革命護國主義」是指許多沙皇時代反戰的革命者，在沙皇垮台、民主革命成功後認為戰爭性質已經改變，其中的一些人引法國革命後與歐洲諸王反法聯盟的戰爭為例，認為民主俄羅斯與英美法這些民主國家為一方、德奧土保幾個專制王朝為另一方的戰爭已經成為民主對專制的戰爭，因而主張爭取戰爭勝利，反對媾和，尤其反對背着民主盟邦而與德皇單獨媾和；而更多的人雖然仍主張退出戰爭，但面對德國大舉進攻的形勢也主張先打退敵人以保衛革命，然後再爭取有尊嚴的和談。其實布爾什維克自己掌權後也是這樣做的，但在他們上台前卻一直反對為保衛二月革命的成果而戰，主張現在就要和平，所以「革命護國主義」當時成了其抨擊的對象。

⑱⑲⑳ James Bunyan and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Hoover War Library Publications, No. 3) (London: O.U.P., 1934), 133; 91-92; 133.

㉑㉒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182.

㉓㉔ 費希爾(Louis Fischer)著，彭卓吾譯：《神奇的偉人：列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220。

⑳ 關於這幾屆臨時政府的構成與政治色彩的演變，詳見蘇文：〈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頁12-13。

㉑㉒㉓㉔㉕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6；184-87；182；184；182-83。

㉖ 例如，二月革命後第一個權力機關杜馬臨時委員會還是右翼自由派（十月黨、進步黨等）為主，其後的第一屆臨時政府改以左翼自由派（立憲民主黨）為主。而7月24日和9月25日上台的最後兩屆臨時政府都已以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為主了。

㉗ 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ё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57г. стр. 353. 後來調查說當晚共有六人傷亡，並非「未流一滴血」，但「幾乎沒有流血」是可以說的。

㉘ 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ё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57г. стр. 392-93.

㉙ 參閱聞一：〈「列寧在十月」〉，《學習時報》，2007年5月7日。

㉚㉛ 1917年11月9日盧那察爾斯基致妻子的信，載《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一卷，頁66-67。

㉜ Л. Г. Протас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г. стр. 241-42, 248.

㉝ Ш. М. Мунчаев, В. М. Уст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1999г. стр. 311.

㉞㉟ 這個數字是列寧當時收到的報告所說。後來布爾什維克的公開報導說是兩萬人，甚至說只有五千人。見多伊徹 (Issac Deutscher) 著，王國龍譯：《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410；282。

㊱ 高爾基著，朱希瑜譯：《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60-61。

㊲ 參見金雁：〈讀不懂的高爾基〉，載《火鳳凰與貓頭鷹》（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114。

㊳ 布爾什維克當時（據斯維爾德洛夫[Я. М. Свердлов]1月12日在蘇維埃「三大」上的講話）承認有二十一人在鎮壓1月5日抗議示威時被當場槍殺。（См.: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голос. 1918. 12 января речь Я. М. Свердлова на III съезда Светов）反對派方面估計的數字要大得多。

㊴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42-43。

㊵ 徐天新選譯：《世界史資料叢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10。

㊶㊷ 轉引自多伊徹：《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頁523；446。

㊸ 參見Н. Г. Думова, 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и её разгром. М., 1982; Васильев, Г. А. Барьба проти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период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Красноярска от колчаковщины. красноярскстр. 1972等書。

㊹ 那時不僅左如布爾什維克疾呼召開立憲會議，皇位繼承人米哈伊爾大公（Р. Михаил，末代沙皇之弟，當時迫於革命的沙皇已禪位於他）在辭位詔書中也宣布：「偉大的俄國人民應該進行全民投票，通過自己在立憲會議中的代表來確定治理方式和俄羅斯國家新的根本大法」。參見阿寧 (D. Anin) 編，丁祖永等譯：《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1917年革命》（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111。因此在立憲會議被廢除、沙皇被殺前，即便右如保皇派，要造反也是缺少起碼的口實。

金雁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著有《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等。